

【文学研究】

多元文化语境下的海外华裔文学

杨建国

(长安大学 外国语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54)

摘要: 海外华裔文学的文化身份认同是近年来文学界比较关注的问题。通过比较分析,以“寻根”和“归化”为线索,对海外华裔文学在西方社会的多元化及所在国主流文化氛围的发展过程进行分析。分析认为,华裔文学从“寻根”到“归化”的发展历程是中国文学从民族的、封闭的走向国际的、多样性的文学现象。分析结果表明,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必须克服民族文化中的地方性、局限性,走向多元化的普遍性和自然性。

关键词: 文学; 多元化语境; 海外华裔文学; 寻根; 归化; 文化身份

中图分类号: I3/0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248(2007)02-0083-04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 in pluralistic cultural environment

YANG Jian-guo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54, Shaanxi, China)

Abstract: In the environment of pluralistic and dominant western cultures,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s progress from nostalgia to naturalisation is the cultural exhibition of Chinese culture's development from nationalization and obturation to international and diversity.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overcome the regionality and localization in the national culture to make for the universaliz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in the world literature.

Key words: literature; pluralism;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 nostalgia; naturalisation;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0 引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动摇,多元文化迅速崛起。“全球政治正沿着文化的界线重构,文化相似的民族和国家走到一起,文化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则分到扬镗”^[1]。国际文学界的有识之士有一种在国际多元文化中寻求和谐的愿望。中国有着几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就要主动与异国文化对话。而海外华人文学“正是古老的中华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短兵相接的前沿阵地”^[2],也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汇的结晶。海外华裔文学从“寻根”到“归化”的过程正是中国文化从民族的、封闭的走向国际的、开放的文化现象的表现。

海外华文作家到了异国他乡,在感受到异国文化差异的同时,会反思自己,从而在反思当中再发现和创造自己,这就为华裔文学在发展中增添了新的基因。他们对本土的文化和以往的生活有新的发现和体验;这是因为他们从中国移居西方,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而中国过去传统的理论基因、文化审美观念与西方不同,他们在创作或从事文学研究的时候,引进了西方的视角,使读者直接从这些作品中了解到中国的文学和文化。

人们在承认多元文化存在的同时,强调的是由血缘、族缘关系决定的群体身份,它严格地维护着民族和种族群体的界限^[3]。但近年来,人们也开始用后现代文化理论中的多样性、混合性去看待文化身份问题。文学的族群性、地方性本身都在分化和兼

容,人们在确认自身身份时,既以民族的方式连结历史,也以公民、国民的方式沟通现实,并以这两者想象自身在多元化语境中的位置。

1 “寻根”的华裔文学

海外华裔文学的“寻根”倾向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开始出现的。马来西亚华裔作家林幸谦在《溯河鱼的传说》一文中,激情难抑地描述自然生物界的一种恒久的奇迹:在海中长大的鲑鱼会在它们临产之时,凭着它们天生异禀的嗅觉,溯河洄游到它们生命开始的河流源头,即便路途充满艰辛,它们也会执着地寻游到目的地,在那里产下鱼卵,让它们的后代庄严地开始一个新的生命轮回。溯河鱼甘冒生命危险寻找出生地的悲壮历程隐喻海外华裔对中华文化母体一往情深的孺慕及回归。马来西亚华裔民族是个看重“落地生根”的民族,几代定居南洋的经历已经使马来西亚华裔民族融入了当地的生活。因此,他们表现出来的“寻根”倾向就格外引人关注。

“寻根,不是寻美裔的根,而是寻中华民族在异乡的花果飘零”。这是著名旅美作家张错于 1985 年当其小说《黄金泪》在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中国大陆同时出版时写下的话语。《黄金泪》是张错“追随史诗典范”而以“春秋之笔”评说第一代华工在“淘金”狂潮中来到美国加利福尼亚之后那“永远是异乡飘泊,永远是黄金梦继续追寻,永远没有大结局”的历史的一部力作,作品生动地呈现了美国开国神话族谱中的华人万千辛酸。而更重要的,它不是将目光投回到黄河、长江去寻根,而是在美国土地上寻觅先祖的苦难脚印。“寻根”、“探史”于华人留在美利坚土地的足迹中的是落地生根中的寻根,是在“与当地融合没有隔阂困难”后的寻根。在这种寻根中,作家们并没有因为自己现今良好的生活状态,甚至自己的后代将“自然而然的成为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而将历史淡化为软性朦胧的思乡哀愁,他们执着地在当年种族歧视的血泪、资本拓荒的辛酸中寻觅先祖的踪影,以探寻美国华族未来的命运。

华裔作家喜好探讨身居不同世界之间的尴尬和困顿,他们笔下的中国充满了民间情趣、民俗遗风。从他们的主体特征来看,一方面,他们都有一个文化的“依母脐带”,心中都有一个会讲故事的母亲,从那里他们汲取了丰富的中华营养,延续了中华文化精神;另一方面,他们的文字与经验品格在作品中产生了强烈张力,他们的创作往往是用英语表现的中国意识,文化“依父脐带”难拆难解。他们的作品对中华文化是直承式的——他们大都是用西文写中国故

事。他们并不需要一个“会讲故事的母亲”作为文化遗产的传递者,中国根深蒂固地生长在他们的体验世界里,完全不可能漠视。

无论是移民去海外的华人英语作家,还是在海外出生的华裔作家,他们的作品都离不开“寻根”族性的中国。“他们在大洋彼岸,以充满乡愁的笔墨描述自己的祖国。在他们的叙述中,地理上的本土中国与超越地理范畴的文化中国有时是重叠在一起的”^[4]。正如林语堂所言:“自我反观,我想我的头脑是西洋的产品,而我的心却是中国的”^[5]。一副早期留美学生的对联写道:“望洋兴叹,与鬼为邻”,难以化解的乡愁产生于跟居住国文化的格格不入之中。

正是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海外华人知识分子已经历了长期的为“认同危机”所困惑的心路历程。很久以来在地缘、政治、文化、身份认同等层面上的“边缘”心态开始摆脱对“中心”的疏离,而代替以对“中心”的对话。20 世纪 90 年代李欧梵就曾这样明确自己的双重边缘立场:我对于“漂流的中国人‘和’寻根”作家的情绪上的认同固然是因为其中包含的共有的边缘性,只是我在面对中国和美国这两个中心时,我的边缘性是双重的。

如这篇《风波》,作者急切地发出了对美国的国家认同意识。小说中的太平山市美国退伍军人会的三分之一创会会员是来自中国的移民,他们在二次大战中服役于美国陆、海、空军,转战世界各地,他们虽有同乡关系,却没有因此形成小圈子,而是视美国为自己国家,尽力尽责,所以跟逃避兵役的余财亨发生了冲突。余财亨振振有词为自己辩护:“我是中国人,美国对我是异乡异域……美国被迫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是为我们中国人的利益而战,而是为了美国人的利益……”。而在华人老兵激昂的坚持正义战争的斗志中,还有着这样特别的意味,华人不再是出于物质层面上的生存原因而认同美国,而是基于人类进步的愿望和实践,视美国为自己的国家。

2 “寻根”中的归化历程

华裔作家在美国文坛声名鹊起是在 1976 年汤婷婷发表《女战士》之后。《女战士》将中国神话、传说和戏剧故事与实现美国梦的经历巧妙地糅合在一起,在美国和欧洲引起轰动^[6]。谭恩美 1988 年发表的《喜福会》也取材于自己家族的经历,用母女针锋相对的冲突暗喻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任璧莲 1991 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典型的美国人》,其华裔主人公受过美国高等教育,乐于接受强势话语,因而很快适应主流社会的游戏规则。该书被誉为华裔作家描写

华人追求“美国梦”最成功的作品之一。

哈金的《等待》讲述军医孔林要和缠足的乡下妻子离婚,娶一位“现代”女性——医院的护士长曼娜,结果等了18年才如愿以偿^[7]。而此时曼娜已患绝症,孔林又要求发妻等他。旅英学者赵毅衡认为,哈金描绘的不是离婚,而是中国人“过分的忍耐”。哈金其他小说中的男人也和孔林一样,几乎都没有闪光激越的品质,也不具备爱的能力,但总能将平庸、乏味的生活活下去。中国英美文学学者朱虹指出,西方读者想当然地把《等待》看作是写中国的作品。其实哈金写的是一个人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可以在中国发生,也可以在外国发生,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与哈金相反,裘小龙在《忠字舞者》中塑造的刑警队长陈超,却是一位时尚人物——他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年轻英俊,既是党员又是诗人,还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官场、职场、情场都游刃有余。在破案过程中,陈探长还不忘精神和物质的双重享受:读李商隐、吃大蟹、说英语、下舞池……。裘小龙认为,自己用英文写的小说能获奖,一半是因为他注意到西方人的阅读口味,另一半就是因为从小浸染在东方文化里。他再三强调“写作时必须意识到特定的文化读者群的需要”。严歌苓说:“外国人对中国作家普遍的反映就是多愁善感,遣词造句抒情太多。作者认为非常感动,很可能到美国文化中就是太过分的多愁善感”。这就不难解释,像哈金那样的简练、冷峻、不露声色的创作语言,为什么能征服美国作家界。

西方社会一方面以其主流文化的强势“压力”催使“异族”的归化,另一方面却又以其多元文化的格局而警醒“异族”的寻根。这种将“寻根”和归化原本对峙的矛盾双方协调的局面是20世纪80年代后世界文化的一个进步,它使海外华文文学有可能在执着民族传统和认同居住国文化之间找到契合点,在留摄下海外华族在归化中“寻根”的历史身影的同时,也为自身构筑一个充裕开放的生存环境。

对于美国的华裔作家,他们的现实和记忆似乎不得不分裂成两个世界。在现实中,他们认同美国宪法确立的价值观念并不困难,衣食住行的适应也并无大的障碍,他们实际上处于已归化或正在归化的状态中。然而,在他们的记忆世界里,恰如刘绍铭所言,仍存在着种种文化上的“心魔”,无法拔除,也难以逾越。而这种两栖、中介的角色,也许恰恰是全球化进程中海外华人角色转换的前驱。

文学本身不仅包含多种文化,而且每一个个体都包含不同身份的多样性,随着跨国度移民生活和都市疆域的扩展,人们的社会生活经验已经开始提

供种种强调边缘而非强调界限的想象。这种情况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多元种族国家尤为明显,而作家在这种情况下中显然是最富有想象力的。如果说,早期移民中像木令耆那样抱有“他乡即故乡”的心态,在“他者”的呈现中寄寓故乡的尚属少数,那么,20世纪90年代后新移民的创作中,不再把“双重边缘”^[8]视作异国人生的一种困境,相反却凭借“边缘”来沟通不同文化的创作多了起来。王瑞芸的中篇小说《戈登医生》在“情圣”戈登医生以藏匿亡妻尸体的方式表达其眷恋娇妻之情的故事框架中容纳的正是不同种族文化的共同之处。小说让人感慨万分的并不是那个自诩为“人权卫士”的国度对活生生人性的扼杀,而是戈登医生家的黑人女仆凯西、领养的中国女孩爱米,乃至“我”对白人医生戈登的“反常”举止的理解。在藏匿尸体的戈登医生家宅,没有丝毫的阴森,反而充溢着温馨、真诚、谅解、宽容,不同肤色的人似乎一起回到了古典时代,东西方民族都被对方的美所吸引、震撼。小说写得充实、隽永,戈登和他中国妻子墓碑上的那行字“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园,我们仅是携手路过”,是这一对中西恋人对世界的共同理解。夏悲的《原始森林里的情人》在呈现中西文化冲突的同时,也显示了两者的互容性。出身英国贵族门第的加拿大嬉皮士麦可和崇尚内心修养的华裔博士生丽是各自家族的叛逆者,在北美森林所充溢的原始生命和龙卷风所意味的生命困境面前,这对性格迥异的异国男女都改变了原先的生活轨迹而心心相印,他们的邂逅颇有意味地象征了中西文化共同具有的返朴归真趋向。

“寻根”过程中的归化,不仅促进华人融入当地社会的进程,而且有利于民族性格的拓展和提升。刘荒田在《向后代播种乡愁》中表述过那种“为了自己先后拥有的两个国籍而自豪”的“乡愁”,这种“只留精华,而淘尽糟粕”的“乡愁”,是“把故乡带回日常生活的国度——它,我称为异乡……却是后一代安身立命的本土”^[9]。刘荒田20世纪80年代移居美国,很快消弥掉“异乡”和“本土”的鸿沟,以坦然心态落根于异域,实在是一种令人感慨的新移民性格。他在多篇作品中述及异域生活对中国传统的面子观念、依附性格、人际陋习的冲击,例如那篇“洋插队”和“斯文扫地”,在以切身经历自自然然地扫落了华人“官自读书高”的旧庭训和“赚钱不吃力”的新世风时,坦言在职业平等、自尊自立上“以进一步洋化为好”,摆脱“自卑自欺自怨自怜”心理,以“厨房牛”的职业做“顶天立地的大写的人”。这种摆脱了意识形态偏见、逼视民族灵魂的开阔视野的获得,多少反映

了新移民性格的完善、健全。而这对于五四新文学开拓的“改造国民性”^[10]的主题,其丰富的意味会对华裔文学史产生日益重要的作用。

3 结 语

“寻根”和“归化”并存,也并非纯然乐观的局面,而是危机四伏。全球化语境中本来就遍布陷阱,而其中的文化陷阱则被为人们漠视。文化生产的价值在于其地方性和民族性,文化差异的内在性和不可克服性也相当复杂。不同文化间能否真正平等取决于其相互对待的主体间的态度是否平等。“寻根”和“归化”本是两种相反趋势的文化行为,伸向截然不同的文化实体,海外华文文学要在这两者之间取得平衡,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被迫和无奈。居住国文化的强势状态、殖民话语的余威等仍然存在。在这种境况下,华文文学自身没有充分的积累和准备是难以应付的。

参考文献:

- [1] 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上接第 82 页)

比重的 6.7%, 占政府财政支出总额的 34.24%; 而社会文教费用为 5 213.23 亿元, 占当年 GDP 比重的 5.4%, 占政府财政支出总额的 27.58%。这说明中央政府公共财政体系必须做出方向性的调整^[9-11]。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重点在农村, 义务教育在理论上应该是免费的, 但是农村学生的学杂费相对于农民的收入而言仍然太重。根据国家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 现在农村教育经费中中央政府只负担 2%, 省、地(市)级政府负担 11%, 县级政府负担 9%, 78% 的经费要乡镇这一级政府解决。在义务教育的经费投入问题上, 必须实行城乡一体化。

4 结 语

中国政府要逐步降低经济性服务支出的比重, 增加对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卫生、科技补贴、环境保护等社会性公共服务的支出, 使社会性公共服务的支出成为政府公共服务支出的主体。

参考文献:

- [1] 朱相远. 以新改革观构建和谐社会[N]. 环球杂志,

[M]. 周 琪, 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9.

- [2] 胡 勇. 文化的乡愁[M].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3.
- [3] 赵文书. Positioning contemporary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in contested terrains[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 [4] 董鼎山. 留美三十年[M].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8.
- [5] 林语堂. 林语堂自传[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1.
- [6] 潘亚敏. 海外华文文学的现状[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6.
- [7] 哈 金. 等待[M]. 金 亮, 译.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2.
- [8] 保罗·埃文斯. 费正清看中国[M]. 陈 同,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 [9] 钱 穆. 中国文化史导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4.
- [10] 爱德华·萨义德. 东方学[M]. 王宇根,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2005-04-05(2).

- [2] 高尚全. 构建和谐社会: 三大挑战与四大问题[J]. 人民论坛, 2005, 14(5): 71-74.
- [3] 郭小聪. 论国家职能与政府职能[J]. 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97, 43(2): 47-49.
- [4] 刘志生. 构建西部和谐农村的经济学思考[J]. 理论导刊, 2005, 27(9): 22-25.
- [5] 国家统计局. 国家统计年鉴[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2.
- [6] 徐 超. 财政约束条件下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创新[J]. 理论导刊, 2005, 27(8): 41-44.
- [7] 盖伊·彼得斯. 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M]. 王大可,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 [8] 张永春, 蔡 军. 论社会保障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正向作用[J]. 理论导刊, 2006, 28(1): 14-18.
- [9] 吕宏强. 政府社会管理的前提及面临的问题[J]. 长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5, 7(1): 40-42.
- [10] 戴维·奥斯本. 政府改革手册: 战略与工具[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 [11] 孟宏斌. 陕西小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创新[J]. 长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6, 8(2): 19-22.